

信仰研究视野论

信仰本质论

当代

信仰机制论

中国

荆学民◎著

信仰类型论

DANGDAI ZHONGGUO
SHEHUI XINYANG LUN

社会信仰论

信仰危机论

信仰重建论

信仰重建论

马克思主义信仰论

人民出版社

信仰研究视野论

信仰本质论

当代

信仰机制论

中国

荆学民◎著

信仰类型论

DANGDAI ZHONGGUO
SHEHUI XINYANG LUN

社会信仰论

信仰危机论

信仰重建论

信仰重建论

马克思主义信仰论

策划编辑:王善超

责任编辑:李椒元

装帧设计:肖 辉

责任校对:胡 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中国社会信仰论/荆学民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10
ISBN 978-7-01-007323-1

I. 当… II. 荆… III. 社会-信仰-研究-中国-现代 IV. B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44055 号

当代中国社会信仰论

DANGDAI ZHONGGUO SHEHUI XINYANGLUN

荆学民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2008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13

字数:302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7-01-007323-1 定价:30.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序

陈晏清

学民对信仰问题的研究有着信仰般的执著。二十多年前,学民在南开助教进修班的时候,就表现出研究信仰问题的浓厚兴趣。几年以后他重回南开从我攻读博士学位,仍将信仰问题作为学位论文的选题。信仰问题是当代社会生活中的重大问题,也是哲学研究中的重大问题,学民又有浓厚的兴趣和一定的研究基础,所以,开始我对他的选题是非常支持的。但是,当他后来谈到具体的思路时,我对他的研究路径却表示了非常的不支持。他最初的论文设计,是要构建一个包罗信仰问题的方方面面的《信仰论》体系。这与我的治学理念是相悖的。

当时,南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已经将社会哲学作为主要的博士研究方向。我们的社会哲学研究确定以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为切入点,以研究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的重大问题为中心,而不从概念、原理出发,不搞体系先行。信仰问题无疑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重大现实问题,无疑是我们的社会哲学必须予以关注和研究的课题。因此,我建议他先不要把“信仰”作为一个理论体系去考虑,而把信仰作为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发生的一个“问题”去对待。这样,论文的题目就确定为“社会转型与信仰重建”。这篇论文做得比较成功,受到论文评阅和答辩专家的好评,并纳入由我主编的“社会哲学研究丛书”出版,出版后受到学

界的广泛关注。我想,如果按照他最初的设计,论文不一定会有这么好的学术质量和社会效果。

当然,不论对于何种问题的研究,都要求有对于该问题的系统性的理论解决,而且,作为哲学的研究来说,还不能停留于问题的层面。对于某些重大的问题,例如“信仰”一类的问题,通过专门深入的研究而构成一种相对完备的理论体系也是必需的。要建立某种相对完备的理论体系,当然就应有对于相关的基础理论的研究,但是,对于基础理论的研究也要以对于现实问题的研究作为基础,要善于把现实问题研究的理论成果有效地汲取到基础理论的研究中去,而不是从理论到理论的抽象研究。这就是说,整个研究工作都不能从“体系”入手,而应当从“问题”入手。离开对于现实问题的研究,直接去构造体系,这样的研究路子,在通常情况下都是不成功的,对于刚进入学术领域不久的年轻学者来说,更不可取。

学民在博士毕业后的十来年里,扭住“信仰”问题不放,写了几十篇论文,涉及信仰问题的基础理论的许多方面。现在将这些论文中的重要篇章结集出版,颇似一部预先有所设计的专著,颇似一个有目的地建构起来的信仰论的理论体系。但这个“体系”却不是按我在前面所批评的那种路子建立起来的,而是以“问题”的研究为基础,或以“问题”为背景的,因而读起来不仅有一般理论体系的整体感,而且有很强的现实感。我想,如果按照他当初设计的路子,不一定有现在这么好的成果。

学民对于信仰问题的研究那么执著,这种学术精神很值得提倡。学民在学术研究上能取得优秀的成绩,我由衷地高兴。在他的论文集《当代中国社会信仰论》付梓之际,说了上面这些话,是为序。

陈晏清

2008年夏于南开园

目 录

绪论 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论	(1)
第一章 信仰研究视野论	(22)
时代要求我们坚持正确的信仰	(22)
在知情意的交叉点上——信仰论纲	(29)
信仰作为“人类掌握世界”的永恒方式	(41)
信仰：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根本	(55)
第二章 信仰本质论	(58)
信仰价值的本质	(58)
信仰价值的发生	(69)
信仰价值的结构	(80)
信仰价值的特性	(96)
信仰价值的地位	(105)
第三章 信仰机制论	(116)
信仰与怀疑的关系	(116)
信仰与理智的关系	(128)
信仰与人格的关系	(137)
信仰与真善美尺度	(146)
信仰与人类终极关怀	(158)

第四章 信仰类型论	(173)
个人信仰与社会信仰	(173)
政治信仰及其当代意义	(183)
道德信仰及其当代意义	(195)
第五章 信仰功能论	(215)
信仰的精神统摄功能	(215)
信仰的价值评价功能	(228)
信仰的社会控制功能	(234)
信仰的审美定向功能	(247)
第六章 信仰危机论	(261)
信仰危机的发生与后果	(261)
信仰危机的文化因探索	(274)
信仰危机的经济因探索	(287)
第七章 信仰重建论	(297)
信仰重建:社会背景与理论基础	(297)
信仰重建:社会与文化发展维度	(310)
信仰重建:人的全面发展之维度	(316)
信仰重建:走出信仰的二律背反	(327)
信仰重建:适度张力的三个原则	(333)
信仰重建:通达神圣的重要路径	(338)
第八章 马克思主义信仰论	(356)
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信仰的理论思考	(356)
当代意义:马克思共产主义学说的三重维度	(375)
关于马克思主义信仰学的若干思考	(386)
马克思主义信仰学的学科视野	(393)
后记 我对信仰的研究	(408)

引论 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论*

自人类文明的历史脚步从传统农业文明迈向现代工业文明以来,“现代社会转型”便成为理论家们用来描述和解释人类社会进步的普遍哲学用语。当中国自觉地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以后,它便更成为中国理论界用来描述和解释市场经济确立前后中国社会整体状貌和当代景况的核心范畴。但是,如何自觉地理解和深刻地把握“现代社会转型”的性质、态势和目标,却仍然是一个理论难题。所以,很有必要对这个问题作以理论的探讨。

一、现代社会转型的基本性质是人的理想性的历史自觉活动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如下三个层次来理解:

第一,人类社会本身是人的自觉的相互交往活动。

毋庸讳言,长期以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并没有真正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精髓。这具体地表现在把人类社会及其历史发展理解成了一种“自然的历史过程”,认为人类社会及其历史同自然一样本质上是客观的物质体系;是由其内部固有矛盾所推动的同自然一样的合乎规律的辩证发展过程,因而我们有可能像自然科学那样用精确的眼光来考察研究人类社会。

* 本文原标题为《现代社会转型的性质、运演和趋势》,刊发于《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

其实,马克思当年并没有直接说过人类社会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而是说“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同自然的进程和自然的历史是相似的”。^① 这里有两个层面需要我们注意:其一,马克思说的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而不是人类社会整体的发展。如果只从经济结构的眼光而不是从人类社会整体的眼光去审视人类社会及其历史发展,就必然会导致人和社会、人和历史的彼此脱离,因而根本无法看到人类社会及其历史发展之“人的自觉所为”的性质。其二,就是在社会经济形态的意义上,马克思也认为它的发展历史也只是和自然的进程、自然的历史“相似”,而不是直接的等同。“相似”的意思主要是强调社会经济形态发展有像自然规律那样的自身的规律性。从根本上说,人类社会及历史发展虽然具有类似于自然的客观规律性,但理解这种客观规律性不能把它推及到一种天然的自在性,而应从人本身及社会本身的必然性及其表现方式上去理解。马克思早就明确地指出:“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② 人们的交互作用显然不是人和自然之间的交互作用,而是一种主体间性。主体间交往的普遍性对人们来说就是一种具有必然意义的客观性,因此,要用人活动自身的客观性和必然性而不是用人以外的“客观必然性”来说明人类社会历史,否则便会像马克思所说“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人对立起来”^③。

第二,现代社会转型是人对自身社会推进、构架和创新的特殊历史活动。

① 马克思:《资本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3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2页。

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我们不但把人类社会本身理解成一种具有像自然界一样客观性的物质系统,而且更把人类社会的活动变化和发展过程理解成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性过程。社会转型、社会变革乃至社会革命都被一般的理解为人类社会按照自身规律运演的过程。现在看来,这些观点都必须进行彻底的清算。如上所论,既然人类社会本身不过是人的一种相互交往活动,那么,作为这种活动的运动过程也必然地要显示出人按照特定目的进行交往的自觉性。正像马克思所说:“‘历史’并不是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①

现代社会转型正是把人类社会放在历史发展的动态过程中进行考察和把握的特殊范畴。其特殊性在于,它比一般的社会变迁或社会的运动和发展范畴更为集中地表现出人类社会发展的这种自觉性。国内目前关于“社会转型”的观点很多,但基本上是从诸如社会学或历史学或经济学等一些不同角度或层面对社会转型作出描述或界说的。例如,有的同志把社会转型直接等同于发展,说“发展就是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一种社会转型与成长的过程”;有的同志认为,社会转型是一种整体的发展;是一种特殊的结构性变动;是一个数量关系的分析概念。针对这种情况有人主张关键是变换思维模式,即由社会学的从结构变动到人与社会关系的思考,转向社会哲学的由人到结构变动再到人的思考。经过这种转换以后,就应该把社会转型理解成“代表着历史发展趋势的实践主体自觉推进历史转折的历史创造性活动。当社会生产力提出指向发展的新要求时,历史的实践主体按照确认的‘发展逻辑’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8—119页。

辑',对原型社会的结构、体制进行全面、系统地自觉转变,以求实现社会演化的创新"①。应该说这种观点对现代社会转型的理解更侧重于从主体介入客体的角度,把社会变化解释为主体的自觉运作和推进,反映了人可以改变社会结构及社会制度,可以影响历史进程的性质从而揭示出社会转型之属于人的自觉历史行为的真正本质。但是当这种观点用它的这种理论框架进一步具体地解释人类社会转型“自觉性”的机制和根据的时候,却又落入了我们非常熟识的“经济——政治——文化”三元运作机制模式的套路之中,从而使问题又退回到了原来的出发点。因此,我们有必要把对问题的认识向更深的层次推进一步。

第三,现代社会转型是在特定的未来整体性和终极性的社会理想目标牵导下的人的自觉活动。

按照理论界传统的观点,社会发展变化的最终动力是生产力的发展。虽然在生产力的结构中,人是最活跃最富有革命性的因素,但是,生产力的表现形式却只是一种客观的物质力量。因而,按照这种“经济——政治——文化”的三元运作机制的套路来理解现代社会转型,至多只能使我们理解到社会运动发展的最终因素在于人,或可以说在于个人活动之有目的的自觉性。但是,它却无法从整体上使我们把握现代社会转型之作为社会整体结构及运作机制变革的属人的自觉性特质。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从社会整体运作的未来理想目标的意义上来把握现代社会转型。

社会理想作为对社会成员个体自觉性活动当下状态的超越和升华,是对社会整体转型或发展未来目标的指向。因此,它同历史目标、历史的未来趋向是紧密相连的甚至可以说是同一逻辑序列

① 张雄:《历史转折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第199页。

的范畴。雅斯贝尔斯在其历史哲学的代表作《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把历史目标作为历史哲学最后要回答的问题。他认为,历史的最终目标是历史的统一亦即人类走向整体。在他看来,人类社会起源以来,经过了漫长的史前阶段,后来发展到古代文明阶段。公元前 500 年前后,则达到轴心期阶段。在这个阶段中,虽然中国、印度和西方还是相互隔绝的,但却各自产生了一批伟大的思想家。他们的思想有共同之处,就是意识到人类作为整体的存在。这里反映出人类意识的觉醒,即人类通过反思意识到自身作为整体的本质。但是,这时所谓的人类整体只是意识上的,而不是现实的,现实中人类仍互相隔绝在世界各地。自 15 世纪以来,人类历史进入了科学技术时代,到 20 世纪,科学技术的发展已取得辉煌的成就。在这个时代,世界各地的交往和联系大大扩展了,人类进入了真正的世界历史发展时期。飞迅发展的科学技术以其强大的力量将人类越来越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人类走向一体化的趋势最终将历史实现为统一,使轴心期在哲学家意识中的历史目标成为现实。^①

应该说,雅斯贝尔斯从历史哲学的高度提出历史目标问题本身是有巨大意义的。但是,我们看到,他实际上把历史由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迈进作为历史发展的目标。然而人类社会一体化只能是现代社会转型本身的过程却不能成为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目标或社会理想。也就是说,一体化之后的人类社会还存在一个未来发展的理想目标问题。因此,在我们看来,雅斯贝尔斯的观点对我们这里所要论述的现代社会转型的意义在于他只是提出了问题,而并没有真正地解决问题。

① 参阅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夏出版社 1989 年版。

其实,社会理想或历史目标问题是一个伴随人类社会始终的问题。在世界历史形成之前的历史阶段,由于各个民族的相互隔离性和人类理性本身的局限性,人们无法用统一的标准和科学的形式来认识和把握这个问题,更多地采取神话、宗教空想等形式来把握这个问题。打开任何一种宗教文化系统都可以看到,这个问题是它们的核心问题。比如,在基督教这种历史悠久、影响甚广的宗教文化系统中,它的“三位一体说”、“创世说”、“原罪说”、“天国报应说”等核心命题,无一不是围绕着社会理想或历史目标来展开它的内容的。随着人类社会由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前进,随着人类自身理性的发展,这种宗教形式的社会理想和历史目标逐渐地由空想走向历史的实在。近代空想社会主义之所以成为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强大社会思潮,就是因为它创设了一种社会理想。不管我们怎样地否定它的空想性,它的“乌托邦冲动”所表达的人类社会理想或历史目标对人类社会本身的巨大意义是谁也不能否定的。

当然,空想毕竟不是科学。正因如此,马克思主义才克服了空想社会主义的空想性,使其在坚实的现实性基础上成为一种人类社会的理想目标。因此,雅斯贝尔斯提出历史的目标是人类社会的一体化,我们则可以旗帜鲜明地提出,一体化人类社会的社会理想是共产主义。如果说民族历史阶段,这个问题还无法明察和证明,那么现在世界性的现代社会转型,正在用一种更为清楚的事实证明这一点(当然这里还有一个对共产主义的科学理解问题。)因此,现代社会转型是在共产主义(非马克思主义者可以提出其他的名称却不能改变问题的实质)的具有人类整体性或说终极性的社会理想目标的牵导下的人类自觉的历史活动。

二、现代社会转型的运演态势是社会整体结构运作机制的转变

对现代社会转型的理解,说它是人的理想性的历史自觉活动还只是就它的抽象的根本性质而言的。走出它的抽象的深层结构,从人类社会整体状况流变的层面上审视现代社会转型,就应看到,它既不是社会整体结构的某一层面或系统的发展与变化(比如单纯的经济增长或政治制度变迁),也不是整个社会结构要素的僵死的位移,而是一种社会结构的整体化转型即社会结构运作机制的转型。应该说明的是,这样的理论界说既包含着对业已发生的现代社会转型的反思,当然也包含着我们所要求的对现代社会转型的应然性的理解。问题应从对社会结构的理解开始。

关于社会结构理论的探讨,近年来已有长足的发展,理论形态纷繁多样。但是,基于理论上的深刻比较和实践上的有力检验,我们认为,还是马克思关于社会结构的理论富有生命力。所以,我们的论说还应以马克思的社会结构学说为基础。马克思关于社会结构学说的典型表述是:“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①这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社会结构之“经济——政治——文化”三元结构说。应该承认,自从马克思主义创立并在全世界流行以来,这种三元结构学说被广泛地接受和采用,已经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经典性学说。虽然在马克思主义向全世界传播的过程中有诸如普列汉诺夫之“五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

项因素说”等对马克思三元结构说的进一步深化和具体化,有现代西方哲学或社会学对马克思三元结构说的“超越”、“改造”和“修正”,但都不足以取代马克思的三元结构说。

以马克思的社会结构理论为基础,我们所要把握的现代社会转型,从其社会机制的运作态势上看,是社会结构之某一子项的突出变动或根本改变,还是社会整体运作机制的转变?要准确而深刻地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应实事求是地透过业已发生的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过程,探查其社会机制的运演态势,对其做出清醒的理性反思,在此基础上再回答现代社会转型应该是怎样的一种社会整体结构运作机制的转变。

现代社会转型的基本内涵是指人类历史从民族地域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是指人类社会从传统农业文明社会向现代工业文明社会的跃迁。从世界范围的民族和国家来看,基本上是通过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种“社会形式”或两条“社会道路”来实现其现代社会转型的。所以,首先让我们分别简略地分析一下两种现代社会转型形式或道路的特点。

西方多数的民族和国家是通过资本主义这种社会形式或社会道路来实现其现代社会转型的。一般地说,西方资本主义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是与它由分散的封建王国统一成为民族国家的政治过程相结合的,这种结合使它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经济繁荣和政治强盛并重。但深入地看,在特殊的历史的条件下,资本主义是更突出经济上的繁荣的,这是因为,从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生成上看,是工业革命作为历史发展的火车头带领这些民族和国家进入了迈向现代化的现代社会转型过程。而且,资本主义确立以后,从其社会发展的运作机制上看,是以社会三元结构中的“经济”为统合中心的运作机制。历史地看,这种运作机制,使资产阶级仰赖

于工业革命所造就的现代工业生产方式,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纪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它对人类文明产生了不容低估的贡献。正是在此种意义上,马克思将17世纪以来由资本主义所开创的新时代,称之为有别于传统社会的“现代社会”,有别于工场手工业时期的“大机器工业时代”;有别于以往狭隘的民族历史的“世界历史”时代;有别于以往“自然联系占优势”时代的“社会因素占优势”的时代;有别于以往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的时代。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在历史上所起的积极作用的估价甚至比资产阶级思想家还更为充分。

但是,不能否定和忽视的是,从社会运作机制这个独特的视角来看,资本主义这种现代社会转型形式或道路,其弊端也正是出在它的以经济为整个社会统合中心这一运作机制上。这一机制长期运作的效应,使经济对整个社会产生了巨大的遮蔽性,从而使人们对现代社会转型的观照,只是看到经济动变的光影,而看不到它对相应的政治、文化结构转型的要求。它在理论上导致了人们几乎把现代社会转型所实现的现代化完全地等同于单纯的经济结构转型;把正常的社会发展几乎完全地理解成单纯的物质财富增加。在实践上,导致了人们依赖于现代科学技术对大自然无限制地征采,严重忽视人类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与此相适应,本应是造福于人类的经济财富,也在人对物的绝对性依赖中走向了它的对立面,即对人产生了异化。马克思当年曾明确地指出:“在资产阶级经济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期中,人的内在本质的这种充分发挥,表现为完全的空虚,这种普遍的物化过程,表现为全面的异化,而一切既定的片而目的废弃,则表现为为了某种纯粹外在的目的而

牺牲自己的目的本身。”^①

与西方多数民族和国家通过资本主义的社会形式或社会道路实现其现代社会转型不同,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一些民族和国家是通过社会主义这种社会形式或社会道路来实现自己的现代社会转型的。众所周知,社会主义在这些国家和民族的实现与资本主义在西方一些国家和民族的实现形式恰恰不同,它不是以经济制度的改变为开端,而是以政治制度在整个社会的强制确立为开端的。这当然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而且,如同资本主义在它的社会机制运作中确立的是以经济为整个社会的统合中心一样,社会主义在它的初期,也确立了以政治为整个社会统合中心的社会运作机制。如同资本主义以经济为整个社会的统合中心的社会运作机制,使其取得了巨大成就,为人类的文明作出了贡献一样,社会主义以政治为整个社会的统合中心,同样也创造了历史的辉煌。以中国为例,自近代以来,由于它在世界体系中政治地位的丧失,其现代化的首要战略目标就是政治上“强国”(在强国的基础上富民)。这种由近代以来历史传统所造就的发展导向,在以政治为强力手段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后的新中国,被更加强化。然而,政治上要强盛必须有经济上的后盾,中国共产党人是意识到这一点的。因此,在建国初期,依靠政治上的强力作用,采取特殊手段,迅速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尤其是国有经济完全符合历史的必然要求。在经济不发达的情况下,依靠其特有的以政治为统合中心的社会运作机制,社会主义的中国,国民经济恢复迅速,尤其是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此后,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相应的计划经济,也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伟大的成就。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6页。